

南朝两部《京师塔寺记》辑述

——兼论早期佛教寺院志的渊源与形成背景*

刘欣宇

提要：塔寺记是我国佛教寺院志的早期形态，诞生于南朝时期。宋灵味寺释昙宗、梁史学士刘璆奉敕编撰的两部《京师塔寺记》是其中的代表作。它们记录了六朝南京地区塔寺的基本信息和相关史事传说，是佛教史学与传统地记蓬勃发展、共同影响的结果。此外，两部《京师塔寺记》的编撰还与南朝君主优崇佛教、兴建塔寺的政策和风潮直接相关，是其对内巩固统治，对外宣扬文明与国力的产物。相比对佛教持批评态度的杨衒之编纂的《洛阳伽蓝记》，南朝塔寺记更能代表当时佛教寺院志的主流。

关键词：《京师塔寺记》 释昙宗 刘璆 南朝 寺院志

学界追溯中国佛教寺院志起源时，常将其原点定位于东魏杨衒之的《洛阳伽蓝记》。这种认知由来已久，明代《武林梵志》作者吴之鲸称其“梵志之祖”^①，清代毛奇龄认为：“释氏之有志，仿于洛阳之记伽蓝。”^②曹刚华在梳理佛教方志发展脉络时也沿用了这种说法，认为正是它开启了此类题材编纂的源流。^③《洛阳伽蓝记》确实是现存最早、保存最完整、影响力最大的佛教寺院志，但杨衒之曾上书反对佛教，被初唐高僧道宣《广弘明集》列为“毁灭王臣”，称其“见寺宇壮丽，损费金碧，王公相竞，侵渔百姓，乃撰《洛阳伽蓝记》，言不恤众庶也”^④。寺院志最初撰于反佛者，不禁让人疑惑。

但当我们目光南移便会发现，这一时期南朝也出现宋释昙宗《京师塔寺记》、齐刘俊《益部寺记》、梁刘璆《京师塔寺记》及宗居士《华山精舍记》、《庐山南陵云精舍记》等寺院志。^⑤尤其是两部《京师塔寺记》，不仅与《洛阳伽蓝记》同记都城塔寺，编撰时间也较其更早。隋代官修《众经目录》曾著录10余部中土佛教著作，称其“并是此方名德所修，虽不类西域所制，莫非毗赞正经，发明宗教，光辉前绪，开进后学，故兼载焉”^⑥。刘璆《京师塔寺记》便名列其中，但《洛阳伽蓝记》却未被著录。可见这种题材或许在南朝更加流行，其作品也更受佛教高僧的青睐。

但南朝塔寺记唐代以后几乎全部散佚，只有少量内容保存于史注、类书中。元代陶宗仪

*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佛教方志研究与数据库建设（多卷本）”（20&ZD260）阶段性成果。

① 吴之鲸：《武林梵志》卷8，杜洁祥主编：《中国佛寺史志汇刊》（第1辑），台北明文书局，1980年，第7—8册，第622页。

② 毛奇龄：《西河文集》卷54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87册，第428页。

③ 参见曹刚华：《明代佛教方志研究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236页。

④ 释道宣：《广弘明集》卷6，《中华大藏经》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，第62册，第1006页。

⑤ 参见《隋书》卷33《经籍二》，中华书局，1973年标点本，第985页。《隋志》中两种《京师塔寺记》均作《京师塔寺记》，本文据《高僧传》《世说新语注》《众经目录》《法苑珠林》等作《京师塔寺记》。

⑥ 释法经等：《众经目录》卷7《众经总录》，《中华大藏经》，第54册，第139页。

《说郛》曾以《梁京寺记》之名辑佚，但大多不是原书内容。^①因此，本文将从南朝两部《京师塔寺记》入手，对其内容进行整理，并探讨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因素，展示中国寺院志形成初期的另一面相。

一 南朝两部《京师塔寺记》佚文辑述

塔寺记是中古时期记录佛教人文景观的历史地理著作。与后世寺院志中佛塔作为寺院附属建筑不同，当时许多佛塔先于寺院而建，且往往是其标志性建筑，重要性并不亚于寺院本身，因此合称为“塔寺记”。目前可见的南朝时期以“塔寺记”为名的书籍共有两种，分别为释昙宗《京师塔寺记》2卷和刘璩《京师塔寺记》11卷。

释昙宗，俗姓虢，秣陵人，刘宋时期建康灵味寺高僧。昙宗早年曾师从僧舍学习《大涅槃经》及礼忏、唱导，以此成名并得到孝武帝赏识。其《京师塔寺记》也大约成书于此时，现存佚文4条，见于梁代刘孝标《世说新语注》、释宝唱《名僧传》《比丘尼传》及释慧皎《高僧传》，辑录如下：

1. 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注引《塔寺记》：尸黎密冢曰高坐，在石子冈常行头陀，卒于梅冈，即葬焉。晋元帝于冢边立寺，因名高坐。^②
2. 《名僧传钞》：竺法义，沙门昙宗《寺记》云惠义，不知何许人。^③
3. 《比丘尼传》：昙宗云：元嘉七年（景福）寺主弘安尼，以起寺，借券书见示，是永初三年。^④
4. 《高僧传》引昙宗《塔寺记》：丹阳瓦官寺，晋哀帝时沙门惠力所立。后有沙门安世高，以郑亭庙余物治之。^⑤

刘璩，梁代官员。其先世出于沛国沛县，永嘉之乱时迁居广陵。其父刘臧梁初为著作郎，约卒于天监十七年（518）；其幼弟刘璠少孤，由母亲和刘璩养育，后出仕梁与北周，天和三年（568）去世，由此推断刘璩主要生活于梁武帝时期。^⑥刘璩曾任尚书省外兵郎兼史学士、黄门侍郎等职，撰有《续沙门传》10卷、《京师塔寺记》11卷。

① 参见[日]諏访义纯：《〈梁京寺记〉资料考》，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：《印度学佛教学研究》，1977年，第91—96页。作者指出陶宗仪所辑主要节选自宋代张敦颐《六朝事迹编类·寺院门》梁代内容，书名则始见于《法苑珠林》，但并不清楚其与昙宗、刘璩寺记的关系。此外，杨晓春对《建康实录》所引《寺记》《塔寺记》是否为刘璩《京师塔寺记》有所讨论。参见杨晓春：《唐僧清彻〈金陵塔寺记〉考略》，《南京晓庄学院学报》2013年第5期。

② 刘义庆撰，刘孝标注，余嘉锡笺疏：《世说新语笺疏》卷上之上《言语第二》，中华书局，2015年，第110页。“冢曰”当作“宋曰”，即其名汉语意为高坐（《高僧传》称意为吉友，高坐为时人所呼），见校文。梁初史家所引《塔寺记》多指昙宗所著，且行文格式与刘璩不符，详见后文。

③ 释宝唱：《名僧传钞》，《卍续藏经》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97年影印本，第134册，第14页。

④ 释宝唱撰，王孺童校注：《比丘尼传校注》卷2《景福寺慧果尼传》，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第43页。

⑤ 释慧皎撰，汤用彤校注，汤一玄整理：《高僧传》卷1《译经上》，中华书局，1992年，第7页。

⑥ 《周书》载刘璠“九岁而孤”，“天和三年卒，时年五十九岁”，由此推断其父约卒于梁天监十七年。参见《周书》卷42《刘璠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1年标点本，第761页。

刘璆《京师塔寺记》，又称《梁京寺记》《晋京寺记》《扬都寺记》^①，现存佚文 11 条，见于唐代释道世《法苑珠林》、释法琳《辩正论》、许嵩《建康实录》、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等书。其中《法苑珠林》最多，共 9 条。道世在《杂集部》著录了其所引用的书籍，称“《京师塔寺记》一部二十卷。右梁朝尚书兵部郎中兼史学士臣刘璆奉敕撰”^②。正文中则简称为《梁京寺记》，现节录如下：

1. 《法苑珠林·华香篇》：齐栖霞寺在南徐州琅琊郡江乘北乡频佳里摄山之中，齐高士平原明僧绍以宋泰始中起造。……或有念诵，小有疲懈，山神现形。又著乌衣，身長一丈，手执绳索。僧众惊惧，诵习不懈。^③

2. 《法苑珠林·华香篇》：梁南冥真寺在秣陵县中兴里，普通五年，沙门惠钊起造。……斋会所余，惠钊教化，悉以起寺。^④

3. 《法苑珠林·祈雨篇》：梁安国寺在秣陵县都乡同下里，以永明九年起造。……泉既不竭，乃累砖为井，井犹存焉。^⑤

4. 《法苑珠林·渔猎篇》：梁小庄严寺在建康定阴里，本是晋零陵王庙地。天监六年，度禅师起造。……（邹文立）罄舍家资，回买此地，为立伽蓝。^⑥

由上可知，刘璆在记录塔寺时，常以“某寺在某处（通常为建康、秣陵或周边某里），某年某人起造”为首句，先交代塔寺的基本信息，再叙述建造缘起和感应事迹。这种写法与其他同类作品不同，《洛阳伽蓝记》首句通常为“某寺某人所立，在某处（以御道、城门确定方位）”，如“永宁寺，西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。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”^⑦。又如“景明寺，宣武帝所立也。在宣阳门外一里御道东”^⑧。《建康实录》引唐释清彻《金陵塔寺记》则常以“某年某人造某寺，在某处（与县城的相对位置）”开头，如宋时“置竹林寺。案《寺记》：元嘉元年，外国僧毗舍阁造。又置下定林寺，东区县城一十五里，僧监造，在蒋山陵里也”^⑨。这也成为除时间、地点外判断佚文归属的重要依据。

《法苑珠林·伽蓝篇》载有唐代以前佛寺 19 处，内容分别出自《洛阳伽蓝记》《续高僧传》《集神州三宝感通录》《西域志》等书，但有“晋建元寺并建康太清寺”“宋灵味寺在钟山蒋林里”“晋升平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”“晋白马寺在建康中黄里”4 条出处不明。这些佛寺位于建康、秣陵，由东晋、南朝所造，首句亦符合刘璆《京师塔寺记》的特征，基本可以确定是其佚

① 《大唐内典录》载：“梁外兵郎刘璆奉敕撰《扬都寺记》一十卷。”南朝京师建康位于扬州，故有“扬都”之称。参见释道宣：《大唐内典录》卷 10，《中华大藏经》，第 54 册，第 674 页。

② 释道世撰，周叔迦、苏晋仁校注：《法苑珠林校注》卷 100《传记篇》，中华书局，2003 年，第 2877 页。据众录，“二十卷”应为“一十卷”之误。

③ 释道世撰，周叔迦、苏晋仁校注：《法苑珠林校注》卷 36《华香篇》，第 1152 页。南徐州琅琊郡为侨置州郡，紧邻建康。

④ 释道世撰，周叔迦、苏晋仁校注：《法苑珠林校注》卷 36《华香篇》，第 1153 页。

⑤ 释道世撰，周叔迦、苏晋仁校注：《法苑珠林校注》卷 63《祈雨篇》，第 1888 页。

⑥ 释道世撰，周叔迦、苏晋仁校注：《法苑珠林校注》卷 64《渔猎篇》，第 1916 页。

⑦ 杨銜之撰，杨勇校笺：《洛阳伽蓝记校笺》卷 1，中华书局，2018 年，第 11 页。

⑧ 杨銜之撰，杨勇校笺：《洛阳伽蓝记校笺》卷 3，第 124 页。

⑨ 许嵩撰，张忱石点校：《建康实录》卷 12，中华书局，1986 年，第 409 页。

文，现节录如下：

1. 晋建元寺（在）建康太清里，寺基本宋北第，元徽二年陈太妃起造。……有请福祈愿者，莫不剋谐。

2. 宋灵味寺，（在）建康钟山蒋林里，宋永初三年沙门法意起造。……明旦履行，唯见清泉湛然，因聚徒结宇，号曰灵味。

3. 晋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。晋生乎中，有凤凰集此地，因名其处为凤凰台。至宋昇明二年，齐太祖起造。……（法和）乃于食堂前试凿井，曾不数仞，而清泉湛然，甘香清美，流未尝竭。

4. 晋白马寺在建康中黄里，太兴二年晋中宗元皇帝起造。……由此白马，大法更兴，因改招提为白马。此寺之号，亦取是名焉。^①

晋建元寺条首句原作“晋建元寺、建康太清里寺基，本宋北第，元徽二年宫人陈太妃造”^②。由于脱漏“在”字，原书目录误作“晋建元寺并建康太清寺”，与内容不符；今人据此句读也给理解带来困难，现补入并重新句读如上。该寺与晋无关，陈太妃名法容，为宋明帝昭华。升明三年（479）萧道成受禅称帝后改元建元，寺名应即此时所改，作“宋（或齐）建元寺”为宜。又宋灵味寺条在目录中作“宋灵味寺在钟山蒋林里”，正文脱“在”字，现补入。

《京师塔寺记》有时也被称为《晋京寺记》，很可能是原书记录晋代塔寺的部分或由此形成的节抄本，节录如下：

1. 法琳《辩正论》“庙神奉绢即离蟒身”条引梁外兵尚书刘璆《晋塔寺记》：沙门安世高者，安息国王之太子也，《阴持入经》是其所出也。往豫章至官亭湖，庙神告世高曰……世高还都，以庙中余物于瓦官寺起塔三层。世高后梦神来报云，蒙师作福，已离蟒身。又见《宣验记》也。^③

2. 《法苑珠林·妖怪篇》引《晋南京寺记》：波提寺在秣陵县新林青陵。昔晋咸安二年，简文皇帝起造，本名新林寺。……帝深加敬信，因为圣嫫（道容尼）起此寺焉。^④

南朝建康并无“南京”的别称，“南”很可能为衍字。《妖怪篇》所引《晋南京寺记》应与法琳相同，是《晋京寺记》的误记。而道世并未在《杂集部》中著录《晋南京寺记》（或《晋京寺记》），也未著录昙宗《京师塔寺记》，则当时能够简称“京寺记”者只有刘璆《京师塔寺记》一种。加之该条首句符合刘璆寺记的特征，因此判断其是刘璆《京师塔寺记》佚文。

又《建康实录》中曾引《京师寺记》《塔寺记》《寺记》，未注撰者。中唐以后昙宗寺记基本亡佚，刘璆《京师塔寺记》和释清彻《金陵塔寺记》仍在流传。虽然《塔寺记》《寺记》属于何书尚有疑义，但可简称《京师寺记》者唯有刘璆一种。《历代名画记》《太平御览》亦引此条，与前者大同小异，节录如下：

① 释道世撰，周叔迦、苏晋仁校注：《法苑珠林校注》卷39《伽蓝篇》，第1244、1225页。

② 释道世撰，周叔迦、苏晋仁校注：《法苑珠林校注》卷39《伽蓝篇》，第1244页。

③ 释法琳：《辩正论》卷7《信毁交报篇第八》，《中华大藏经》，第62册，第578页。“尚书”应作“尚书郎”。

④ 释道世撰，周叔迦、苏晋仁校注：《法苑珠林校注》卷31《妖怪篇》，第989页。

案,《京师寺记》兴宁中,瓦官寺初置,僧众设会,请朝贤鸣刹注疏,其时士大夫莫有过十万者。既至长康(顾恺之),直打刹一百万……及开户,(维摩壁画)光明照寺,施者填咽,俄而果百万钱也。^①

总之,两部《京师塔寺记》原书虽已失传,但仍有部分佚文存在,这为探究早期寺院志的形成背景提供了基础。

二 早期寺院志的诞生与南朝崇佛之风

以“塔寺记”为名的早期寺院志在南朝出现,是佛教与传统史学发展共同影响下的产物,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点:

首先,南朝连续的崇佛政策与都城塔寺规模的较早形成,为塔寺记诞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与社会基础。

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、社会矛盾尖锐。佛教作为新兴的外来信仰,亟需世俗权力庇护以求生存发展。世俗君主也往往借助佛教凝聚各个阶层,神话自身权威。而建造塔寺不仅能为僧侣、大众提供必要的活动场所,也可使建造者获得巨大的功德与声望,因此成为南朝崇佛政策与风潮最直观的成果。而由于南、北方的共同信奉,这也成为双方展示文教与国力的手段。南朝宋时诃罗陀国曾奉表文帝,首称“伏承圣主,信重三宝,兴立塔寺,周满国界”^②。梁武帝时干陀利国、婆利国等上表时也使用了类似表述。而北魏平城时期便已开凿石窟、兴建塔寺,迁都洛阳后塔寺数量迅速扩张,极盛时“京城表里,凡有一千余寺”^③。熙平元年即梁天监十五年(516),北魏胡太后起造永宁寺塔,穷极壮丽。《洛阳伽蓝记》借南来的西域高僧菩提达摩之口称赞“此寺精丽,阎浮所无也。极佛境界,亦未有此”^④。正是这种竞争的体现。

而东晋、南朝君主大多崇佛,建康塔寺相对洛阳更早形成规模。孙盛《晋阳秋》载东晋何充“性好佛道,崇修佛寺,供养沙门以数百。久在扬州,征役吏民,功赏万计”^⑤。宋元嘉十二年(435)丹阳尹萧摹之上书文帝曰:“佛化被于中国,已历四代。形象塔寺,所在千数。进可以系心,退足以招劝。”^⑥宋孝武帝也非常重视佛教的作用,在位期间广招名僧,兴建中兴、新安等大寺,还炮制了异僧明慧与天安寺的佛教神话(谓孝武“慧烛海隅,明华日月”,“继天兴祚,式垂无疆”)^⑦。梁武帝时,南朝崇佛造寺之风更盛。梁武帝不仅兴建了法王、劝善、同泰等寺及长干寺阿育王塔,铸造小庄严寺巨像,还时常亲至寺中讲经说法,迎奉佛骨舍利乃至数度舍身出家。郭祖深上言曰:“都下佛寺五百余所,穷极宏丽。僧尼十余万,资产丰沃。所在郡县,不可胜言。”^⑧相较而言,洛阳西晋时仅有佛寺42所,直到孝文帝迁都后才超过百所,这也成为塔寺记更早出现在南朝的重要原因。

① 许嵩撰,张忱石点校:《建康实录》卷8,第242页。又见张彦远:《历代名画记》卷5,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,2019年,第87页。文字略有不同。

② 《宋书》卷97《夷蛮传》,中华书局,1974年标点本,第2380页。

③ 杨銜之撰,杨勇校笺:《洛阳伽蓝记校笺·原序》,第2页。

④ 杨銜之撰,杨勇校笺:《洛阳伽蓝记校笺》卷1,第13页。

⑤ 刘义庆撰,刘孝标注,余嘉锡笺疏:《世说新语笺疏》卷下之下《言语第二十五》,第956页。

⑥ 《宋书》卷97《夷蛮传》,第2386页。

⑦ 释慧皎撰,汤用彤校注,汤一玄整理:《高僧传》卷7《义解四》,第288页。

⑧ 《南史》卷70《郭祖深传》,中华书局,1975年标点本,第1721页。

其次，传统地记与佛教史学的发展，为塔寺记的创作提供了题材参考和内容素材。

地记是我国地方志的早期阶段，是在各地人物传、风土记等基础上形成的区域性地理书。南北朝时地记的数量快速增加，刘宋时便有刘澄之《扬州志》、山谦之《丹阳记》《南徐州记》等约40部地记产生。齐梁时期还出现了总结性的著作，如南齐陆澄合《山海经》以下160家著作，纂成《地理书》149卷；梁代任昉又增收84家，编成《地记》252卷，可见地记编撰的繁荣。^①而随着塔寺数量的增加，相关记载也逐渐频繁，例如庾仲雍《荆州记》云：“晋初有沙门安世高，度郑亭庙神，得财物立白马寺于荆城东南隅。”^②《魏土地记》载：“水东有观鸡寺，寺内起大堂，甚高广，可容千僧……施主虑阙道业，故崇斯构，是以志道者多栖托焉。”^③《水经注》中亦有大明寺、彭城阿育王寺、檀溪寺等众多佛寺出现。因此，当佛寺成为中土都会重要的公共场所和文化景观并形成规模，塔寺记便顺理成章地出现了。

与此同时，随着僧侣阶层不断壮大，佛教史学也获得长足发展，其中尤以僧传、感应传最为繁荣。僧传是专门记录僧侣言行事迹的人物传记，既有单人传记，也有不同种类的合传，例如释法进《江东名德传》，释宝唱《名僧传》、《比丘尼传》，裴子野《众僧传》，释慧皎《高僧传》等。它们通过表彰高僧大德的言行事迹、神通异能来扩大社会影响，为佛教的传播提供助力。感应又称感通，是指个人言行因信仰与否而得到鬼神响应的现象，道宣曰：“三宝利见，其来久矣。但以信毁相竞，故有感应之缘。”^④感应传便是记录这类事迹的书籍，例如刘义庆《宣验记》、《幽明录》，王琰《冥祥记》等。后世常将其视为早期志怪小说，但时人认为鬼神真实存在，往往将其视为稗官野史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便将其归入史部杂传类。

此外，随着中外交流日益频繁，域外行记也不断出现，而印度地区及丝绸之路沿线塔寺正是往来僧侣记录的重点。例如支僧载《外国事》曰：“（佛泥洹后）王敛舍利……诸国王、天人各得少许，斋还本国，以造佛寺。阿育王起浮屠于佛泥洹处，双树及塔，今无复有也。”^⑤又如法显《佛国记》载：“（蓝莫）塔边有池，池中有龙，常守护此塔，昼夜供养。阿育王出世，欲破八塔作八万四千塔，破七塔已，次欲破此塔，龙便现身……阿育王知其供养具非世之有，于是便还。”^⑥此外还有瞿摩帝寺、摩诃毗诃罗精舍、巴连弗邑阿育王塔等众多塔寺。这些都为中土撰述提供了借鉴与启发。

而由于塔寺记吸收大量佛教史学的内容，以致时人并未将其与僧传、感应传明确区分。《高僧传·序录》曰：“宋临川康王义庆《宣验记》及《幽明录》、太原王琰《冥祥记》、彭城刘俊《益部寺记》、沙门昙宗《京师寺记》、太原王延秀《感应传》、朱君台《征应传》、陶渊明《搜神录》，并傍出诸僧，叙其风素，而皆是附见，亟多疏阙。”^⑦可见昙宗《京师塔寺记》中不仅有许多高僧事迹，且往往与神异感应有关。而在刘璆《京师塔寺记》仅存的佚文中，人物便多达22人（皇帝及后妃5人、士大夫3人、外国沙门4人、中土沙门6人、比丘尼3人、庶民1人），其中安世高、释惠钊等高僧都有颇为详细的记录，可以窥见全书的风貌。

最后，昙宗与宋孝武帝关系、梁武帝和刘璆对佛教文本的重视，直接影响了塔寺记的

① 参见《隋书》卷33《经籍二》，第983、984页。

② 释慧皎撰，汤用彤校注，汤一玄整理：《高僧传》卷1《译经上》，第7页。

③ 郦道元撰，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卷14《鲍丘水》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343页。

④ 释道宣：《集神州三宝感通录》卷上，《中华大藏经》，第60册，第931页。

⑤ 郦道元撰，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卷1《河水》，第5页。

⑥ 释法显撰，章巽校注：《法显传校注》卷3，中华书局，2008年，第74页。

⑦ 释慧皎撰，汤用彤校注，汤一玄整理：《高僧传》卷14《序录》，第524页。

编撰。

昙宗《京师塔寺记》是对宋孝武帝崇佛的响应。昙宗师承僧舍，与孝武帝颇有渊源。僧舍“幼而好学，笃志经史，及天文算术。长通佛义，数论兼明，尤善《大涅槃》，常讲说不辍”^①。元嘉七年（430）他受邀住持灵味寺，信众颇多。元嘉二十八年时任南中郎将、江州刺史。孝武帝讨伐江蛮，正在寻阳的僧舍预见内乱将至，与其记室参军严竣曰：“如令讖纬不虚者，京师寻有祸乱。真人应符，属在殿下，檀越善以緘之。”^②严竣将此事告及亲信，“言遂宣布，闻于太祖。时元凶巫蛊事已发，故上不加推治”^③。南朝讖纬流行，类似的僧侣预言在晋宋禅代之际便曾发挥作用，在社会中影响甚大。不久太子刘劭谋杀文帝，孝武帝率军平乱继承帝位，《高僧传》曰：“俄而元凶构逆，世祖龙飞，果如其言也。”^④昙宗“少而好学，博通众典。唱说之功，独步当世。辩口适时，应变无尽”^⑤。加之师承渊源，很快得到了孝武帝的赏识。孝武帝曾问昙宗：“朕有何罪？而为忏悔。”昙宗则以圣王引咎作比，赞美其“德迈往代，齐圣虞殷”^⑥。大明六年（462），昙宗受邀在殷贵妃丧礼上唱导，“帝咨枪良久，赏异弥深”^⑦。作为深受孝武帝赏识的僧侣，昙宗撰记正是对其政策的响应。

而梁武帝敕令史学士刘瓛编撰《京师塔寺记》，意图更加明显。梁武帝非常注重文本对佛教传播的作用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：“梁武大崇佛法，于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，凡五千四百卷。”^⑧《南史》亦载：“时帝大弘释典，将以易俗。”^⑨而面对“象正浸末，信乐弥衰；文句浩漫，鲜能该洽”^⑩的问题，梁武帝又敕撰了《经律异相》《名僧传》《众僧传》等佛教史籍，《京师塔寺记》正是其中之一。这些书籍阅读难度较低，故事性强，为其营造佛国氛围发挥了独特作用。刘瓛本身也以擅长撰述、笃信佛教“有名江左”^⑪，法琳《广析疑论》曾将其与前代郗超、王谧、谢灵运等“江左英彦”并列，称其“皆学综九流，才映千古，咸言性灵真要，可以持身济俗者，莫过于释氏之教”^⑫。可见梁武帝敕令刘瓛撰塔寺记的用意。

总之，在南朝崇佛政策的持续影响下，南方都会中的塔寺相比北方更早形成规模，地记与佛教史籍的编撰也更繁荣，这为寺院志较早在南朝出现创造了条件。

三 南朝塔寺记的影响及评价

明朝葛寅亮在《金陵梵刹志》中曰：“六朝佛寺，多至四百八十，名沉迹灭，靡得而传，无志故也。”^⑬虽然南朝塔寺记在流传中严重散佚，但作为曾与《洛阳伽蓝记》并称的著作，其影

① 释慧皎撰，汤用彤校注，汤一玄整理：《高僧传》卷7《义解四》，第276页。

② 释慧皎撰，汤用彤校注，汤一玄整理：《高僧传》卷7《义解四》，第276页。

③ 《宋书》卷75《严竣传》，第1960页。

④ 释慧皎撰，汤用彤校注，汤一玄整理：《高僧传》卷7《义解四》，第276页。

⑤ 释慧皎撰，汤用彤校注，汤一玄整理：《高僧传》卷13《唱导》，第513页。

⑥ 释慧皎撰，汤用彤校注，汤一玄整理：《高僧传》卷13《唱导》，第513页。

⑦ 释慧皎撰，汤用彤校注，汤一玄整理：《高僧传》卷13《唱导》，第513页。

⑧ 《隋书》卷35《经籍四》，第1098页。

⑨ 《南史》卷70《郭祖深传》，第1721页。

⑩ 释宝唱等编纂，董志翘、刘晓兴等校注：《经律异相校注》卷1，巴蜀书社，2018年，第1页。

⑪ 《周书》卷42《刘璠附刘祥传》，第765页。

⑫ 释道宣撰，刘林魁校注：《集古今佛道论衡校注》卷丙，中华书局，2018年，第216页。

⑬ 葛寅亮：《金陵梵刹志·凡例》，杜洁祥主编：《中国佛寺史志汇刊》（第1辑），第3册，第11页。

响不容忽视。

一方面，南朝塔寺记是了解六朝时期南京佛教景观为数不多的史料，为唐代同类作品提供了范例。例如《比丘尼传》曾引“昙宗云：元嘉七年（景福）寺主弘安尼，以起寺，借券书见示，是永初三年”^①。景福寺又称影福寺，青州刺史傅弘仁于宋永初三年（422）割宅东面建立精舍，以慧果尼为纲纪。元嘉六年（429）狮子国八位比丘尼至此，慧果欲请闍宾求那跋摩授戒，但因人数不足未行。次年弘安尼扩建寺院，应即是为迎接更多比丘尼至此而做的准备。《京师塔寺记》不仅记录了建寺时间，还反映了寺中的人事变动。而灵味寺正是同年由新兴太守陶仲祖所建，昙宗于此出家学法，很可能目睹了景福寺的动工。刘璆《京师塔寺记》也保存有许多珍贵史料，如梁小庄严寺、南冥真寺、安国寺等起造始末皆仅见于此。

南北朝后期，刘璆寺记开始在北方流传。北齐高僧释灵裕著述颇多，佛教史籍有《圣迹记》《佛法东行记》《塔寺记》《破寺报应记》等，其中《塔寺记》并未仿效时空更加接近的“伽蓝记”，而选择南朝“塔寺记”作为书名，可见其好尚。初唐时释彦琮撰《大唐京师寺录传》10卷，《大唐内典录》载：“京师弘福寺沙门彦琮，以宇内塔寺灵相极多，足感人心，开洽诚信，江表梁室著记十卷，东都后魏亦流五轴，而渭阴帝里名寺胜塔独亡述纪。琮愤斯事，创就纂结。”^②东都后魏所传即《洛阳伽蓝记》，而江表梁室所著正是刘璆《京师塔寺记》。中唐时期，钟陵释清彻又在《京师塔寺记》基础上撰成《金陵塔寺记》36卷，并补充了塔寺在梁代以后的兴废信息，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。

另一方面，南朝塔寺基本塑造了佛教寺院志的精神风貌，凸显了其发展的内生动力。诞生于佛教全盛时期的塔寺记具有鲜明的辅教倾向，往往着重描绘鬼神的存在和信毁带来的因果报应。例如刘璆《京师塔寺记》载，建元寺大殿后画有迦毗罗王及毗沙门天王二像，“若有僧侣失仪，童竖褻慢者，无不影响表异，使其恭肃。若使虔敬忏礼，摽心恳切者，必空中有弹指声，或遁绕翼卫其间。有请福祈愿者，莫不剋谐”^③。又载摄山栖霞寺中“僧众及净人等小不如法，及白衣宾客有秽浊入寺者，虎即出现，吼叫巡房，响振山谷，至今犹尔”^④。小庄严寺则是屠夫邹文立因杀死怀孕母鹿身患恶疾，悔恨之余罄舍家资而建。正如鲁迅所言，此皆“记经像之显效，明应验之实有，以震耸世俗，使生敬信之心”^⑤。

但也正因如此，南朝塔寺记在史实考据上存在不足。例如昙宗《京师塔寺记》载高座寺，是“晋元帝于（尸黎密）冢边立寺，因名高坐”^⑥。但尸黎密病逝于成帝咸康年间，慧皎《高僧传》曰：“成帝怀其风，为树刹冢所。后有关右沙门来游京师，乃于冢处起寺，陈郡谢琨赞成其业，追旌往事，仍曰高座寺也。”^⑦中国早期佛塔源于印度窣堵波，成帝所立应是供奉舍利的墓塔。“谢琨”又作“谢混”，字叔源，晋孝武帝婿，历任中书令、中领军及尚书左仆射，后为刘裕所诛，则立寺或晚至孝武、安帝时。昙宗不仅误作元帝，且并未提及由塔而寺的过程，有失严谨。又如安世高度宫亭庙神一事，《荆州记》《宣验记》《安世高别传》分别系于晋初、吴末和太康末年，而昙宗载在东晋。安世高生活于东汉末年，即便长寿也不可能东晋尚在。故慧皎曰：

① 释宝唱撰，王孺童校注：《比丘尼传校注》卷2《景福寺慧果尼传》，第43页。

② 释道宣：《大唐内典录》卷5，《中华大藏经》，第54册，第585页。

③ 释道世撰，周叔迦、苏晋仁校注：《法苑珠林校注》卷39《伽蓝篇》，第1244页。

④ 释道世撰，周叔迦、苏晋仁校注：《法苑珠林校注》卷36《华香篇》，第1152页。

⑤ 鲁迅：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1年，第49页。

⑥ 刘义庆撰，刘孝标注，余嘉锡笺疏：《世说新语笺疏》卷上之上《言语第二》，第110页。

⑦ 释慧皎撰，汤用彤校注，汤一玄整理：《高僧传》卷1《译经上》，第29、31页。

“正当随有一书谬指晋初，于是后诸作者，或道太康，或言吴末，雷同奔竞，无以校焉。既晋初之说，尚已难安，而昙宗记云：‘晋哀帝时，世高方复治寺。’其为谬说，过乃悬矣。”^①

刘璆在安世高事上延续了昙宗的错误，称“世高还都，以庙中余物于瓦官寺起塔三层”^②。又如栖霞寺刘璆称是明僧绍宋泰始中起造，但《高僧传》称明僧绍临终前方“舍所居山为栖霞精舍，请度居之”^③。江总《摄山栖霞寺碑》亦载其“宋泰始中尝游此山，仍有终焉之志”。后法度来此讲经，“中夜忽见金光照室，光中如有台馆形象……居士遂舍本宅，欲成此寺。即齐永明七年正月三日度上人之所构也”^④。可见该寺实为齐时所建。又如刘璆载齐时李叔献曾向惠刳所请长生菩萨许愿，希望担任交州刺史。实现后，叔献雕刻沉香神影还愿，惠刳以百姓供奉于梁普通五年（524）起造南冥真寺。但李叔献在宋泰始时便与从兄长仁割据交州，齐初萧道成被迫任命其为刺史，至永明三年（485）因畏惧征讨还朝，与惠刳并无关系。作为撰史学士，刘璆有阅读皇家藏书的便利，但出于辅教的目的，他并未在意故事中的细节是否可靠。

总之，南朝塔寺记开创了我国寺院志编撰的先河，塑造了佛教方志的基本风貌。但出于辅教的目的，从史志角度看其部分内容的真实性有所欠缺。

结 语

南北朝时期，随着佛教与传统地记的发展，佛教寺院志的早期形态——塔寺记诞生。这种新兴的题材通过对塔寺及相关人物的生动描绘，展示了南北方的佛教文化繁荣。

但与北朝佛教政策的反复不同，南朝基本维持了对佛教的优崇，这使双方塔寺记呈现出不同风格。杨衒之撰写《洛阳伽蓝记》时，洛阳佛寺大多已毁于战火。杨衒之通过塔寺追忆北魏的全盛时代，但也讽刺过度崇佛对国家的虚耗，例如其载长秋寺“中有三层浮图一所，金盘灵刹，曜诸城内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。庄严佛事，悉用金玉，作工之异，难可具陈。四月四日，此像常出……像停之处，观者如睹。迭相践跃，常有死人”^⑤。而两部《京师塔寺记》均诞生于南朝佛教的鼎盛时期，由高僧和崇佛名士编撰，旨在营造佛国氛围，宣扬佛教信仰，这也是塔寺记和后来寺院志发展的内在动力。隋朝攻破建康后，南朝塔寺多被废毁，《京师塔寺记》也在唐代以后散佚，但时至今日江南仍是中国佛教以及佛教寺院志编纂最繁荣的地区，清人吴树虚曾在《重刻大昭庆律寺志》中说：“敢期杨衒《洛阳伽蓝》之编，实愧刘璆《京师塔寺》之记。”^⑥南朝塔寺记的开创意义不应被忽视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）

本文责编：周 全 宿万涛

① 释慧皎撰，汤用彤校注，汤一玄整理：《高僧传》卷1《译经上》，第7、8页。

② 释法琳：《辩正论》卷7《信毁交报篇第八》，《中华大藏经》，第62册，第578页。

③ 释慧皎撰，汤用彤校注，汤一玄整理：《高僧传》卷8《义解五》，第331页。

④ 《全隋文》卷11，严可均编：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中华书局，1958年，第4076页。

⑤ 杨衒之撰，杨勇校笺：《洛阳伽蓝记校笺》卷1，第44页。

⑥ 吴树虚：《大昭庆律寺志》卷首，杜洁祥主编：《中国佛寺史志汇刊》（第1辑），第16册，第5页。